

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第三版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当代西方 文艺理论

朱立元 /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第三版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当代西方
文艺理论



朱立元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3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675-2077-6

I. ①当… II. ①朱… III. ①文艺理论—西方国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6012 号

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三版)

主 编 朱立元
策划编辑 阮光页
项目编辑 范耀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7.7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2077-6/I·1169
定 价 56.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第三版前言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初版于1997年,2005年出了第二版增补版。这十几年来,本教材在全国高校中受到普遍的欢迎,特别是2012年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本教材名列“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十名中的第二名,紧跟在《鲁迅全集》之后。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但是考虑到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文论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的教材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次我们主要在第13章“解构主义”和第15章“后现代主义”这两章中做了一些增补和修改。

第13章中的“耶鲁学派”部分进行了重写(刘琴、黎明博士参与起草,朱立元教授加以充实、整合和定稿)，“德勒兹”部分由胡新宇博士执笔撰写；

第15章中由包亚明研究员执笔增补了鲍曼、凡蒂莫、布尔迪厄和“苏卡尔事件”等四节。

以上两章的其他部分也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修改,使本教材能更加跟上西方文论新发展的态势。

我们意识到,虽经这次修改,本教材一定还有不够完善之处。我们希望听取广大读者的宝贵意见,以便今后在适当的时间作进一步修订。

主编 朱立元

2014年6月

第二版(增补版)前言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版自1997年出版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了。承蒙读者的厚爱,本书重印了多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世纪的到来,当代西方文论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比如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西方虽然缘起比较早,但发展得最火热的时期无疑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第1版对此虽然已经有所涉及,但十分零碎、简略;还有空间理论也是如此。所以,很自然地我们从出版社以及其他途径听到一些读者的建议,主要是希望能够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和材料,以便更加同步地了解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最新态势。我们觉得这个意见是合理的。而且,一本教材,用了八年,还跨了世纪,作适当的修订、补充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出本书第二版的缘由。

本次修订,原第1章—第17章基本未动,主要是请本书原作者之一、南开大学哲学系陆扬教授增写了第18、19两章,即“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新增部分涉及的不少代表人物,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经出现过或者已有介绍的,第18、19章中我们注意重点介绍他们在“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方面的新观点、新思想,其他方面则尽量避免重复。

由于所增补的内容属于西方文论中动态的、正在演变和发展着的那一部分,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不当之处,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今后的修订中再进行修改、完善。

朱立元

2005年1月

目 次

0 导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概观	1
0.1 两大主潮	1
0.2 两次转移	3
0.3 两个转向	4
1 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7
1.1 瓦莱里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	7
1.2 叶芝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象征理论	11
1.3 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	15
2 表现主义	19
2.1 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论	19
2.2 科林伍德的表现理论	23
3 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	28
3.1 诗学探索的理论特征	28
3.2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	32
3.3 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语言学阐释	35
3.4 艾亨鲍姆的科学实证主义文论	38
4 精神分析批评	42
4.1 精神分析批评的一般概念	42
4.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	43
4.3 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	49
4.4 霍兰德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	51
4.5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53
5 直觉主义与意识流	57
5.1 柏格森与直觉主义	57
5.2 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	61
5.3 意识流作家的艺术观点	62
6 语义学与新批评派	68
6.1 理论背景与发展概况	68
6.2 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	70
6.3 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	74

6.4	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	78
6.5	布鲁克斯的“细读法”	81
6.6	燕卜苏的复义理论	84
6.7	维姆萨特和韦勒克的“新批评”理论	87
7	现象学、存在主义与荒诞派	93
7.1	哲学背景与发展概况	93
7.2	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	98
7.3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文论	105
7.4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	112
7.5	尤奈斯库的荒诞派戏剧理论	115
8	原型批评	121
8.1	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	121
8.2	荣格的原型理论	124
8.3	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	126
8.4	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	129
9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上)	132
9.1	理论背景与发展概观	132
9.2	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论	133
9.3	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论	136
9.4	马舍雷和戈德曼的结构主义文论	138
9.5	伊格尔顿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142
10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下)	146
10.1	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	146
10.2	布莱希特以理性为本的戏剧理论	150
10.3	本雅明的技术主义艺术理论	153
10.4	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	157
10.5	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文论	160
10.6	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文论	164
10.7	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166
11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	171
11.1	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背景和主要特征	171
11.2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	175
11.3	巴尔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文论	178
11.4	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	182
11.5	文学符号学概况	186
11.6	文学叙事学简述	191
11.7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	195

目 次

11.8	当代俄罗斯文论的最新发展	200
12	解释学与接受理论	203
12.1	理论背景与发展概况	203
12.2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文论	207
12.3	姚斯的接受美学	214
12.4	伊瑟尔的阅读理论	219
13	解构主义	222
13.1	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222
13.2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224
13.3	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233
13.4	文学解构主义	265
13.5	艾伯拉姆斯对解构主义的质疑	270
13.6	福科的后结构主义文论	274
13.7	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生成论文论	279
14	女权主义批评	288
14.1	女权主义批评的现实背景和思想来源	288
14.2	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	290
14.3	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	294
14.4	其他女权主义批评	298
15	后现代主义	302
15.1	后现代主义的源起与发展概况	302
15.2	贝尔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揭示	305
15.3	哈贝马斯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对抗	307
15.4	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研究	310
15.5	杰姆逊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	313
15.6	哈桑对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的透视	316
15.7	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319
15.8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	323
15.9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	325
15.10	凡蒂莫后现代性美学理论研究	329
15.11	布尔迪厄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334
15.12	苏卡尔事件与后现代的限度	340
16	新历史主义	347
16.1	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347
16.2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351
16.3	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构架	357
16.4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和走向	360

17	后殖民主义	363
17.1	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概况	363
17.2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透视	364
17.3	斯皮瓦克对殖民地权力话语的批判	369
17.4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	374
18	文化研究	375
18.1	理论背景和主要特点	375
18.2	文化主义	377
18.3	结构主义与意识形态	386
18.4	霸权理论及其反思	393
18.5	电视与大众文化	397
18.6	赛义德与文化批评	409
18.7	米勒论文学和文化研究	413
19	空间理论	417
19.1	福科论空间	417
19.2	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生产》	418
19.3	索雅论第三空间	420
19.4	第三空间与《阿莱夫》	423
19.5	重读文学空间	425
20	结语	429
	后 记	434

0 导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概观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书简称当代西方文论,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至今,范畴主要为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的分期当然很难绝对划定一个具体的年代,但如从一个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上来考察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论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西方文论在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等思潮影响下,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突破了古典主义文论的束缚,形成了以浪漫主义(含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含自然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那么,20世纪西方文论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击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文论的、具有鲜明反传统倾向和20世纪新特点即当代性的文学理论。两者的区别是时代性、世纪性的。因此,我们把当代西方文论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划在20世纪。

本书所用的“西方”概念,除了地域含义外,还包括历史文化因素,因此,本书介绍了若干俄罗斯文论,但未介绍前苏联的文论。

20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世纪,是人类创造力空前高涨与迸发,创造出远远超出前19个世纪生产力总和的世纪,是人类科学文化突飞猛进、达到“知识爆炸”程度的世纪;不过,毋庸否认,也是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局部战乱、人类蒙受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与牺牲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和激变的世纪中,人们从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到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到作为人文学科思潮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学理论上。

0.1 两大主潮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大体上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潮。

所谓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其根本特点是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他哲学问题。

所谓科学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它把一切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论根源都归结为数理科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其思想基础在本世纪主要是主观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这两大思潮自20世纪以来时而对立、冲突,时而共处、交错,时而互相吸收,此长彼消,曲折发展,在纷纭复杂、多元展开的哲学大潮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虽有相对独立性,但与这两大哲学主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思想基础、理论构架、研究方法等许多重要方面受其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同样也可把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主潮。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文论的起点之一是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如瓦莱里的象征主义诗论就高度重视人的个性、个体的心灵活动和重建个体的精神史;庞德的意象主义诗论虽有某些形式主义倾向,但在主要方面接受了表现主义的影响,强调诗歌意象应表达诗人感情与理性的“复合”。当代人本主义文论的另一起点是表现主义,克罗齐关于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表现的理论,把非理性的“直觉”提升到人的心理活动的基础地位上,作为解释文学艺术本质的决定性机制。以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文论,则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由此出发,对文艺现象作出种种独特的解释,揭示出许多过去被忽视的文艺创作与接受的重要心理特征,在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发生了深远影响。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文论以“绵延”的生命冲动为基础,用作为非理性的神秘心理体验的“直觉”来说明艺术的本质,对稍后的意识流文论也有重要启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包括荒谬派)文论可以说是 20 世纪前半期思想最深刻、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巨大的人本主义文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就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文论虽然自称“反人本主义”,但其出发点和核心仍然是作为“此在”的人。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还是其他人的,其关注的中心,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全面异化,他们往往希冀通过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或减少异化,求得人的全面(包括心灵)的解放。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受到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的直接启示,非常重视主体的艺术和审美经验在审美理解与解释活动中的作用,基本思路未超越人本主义范围。

当代西方科学主义文论中较早出现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布拉格学派。这一派文论受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问题”,其目标是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即文学中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英美语义学和新批评派文论是当代科学主义文论中另一支影响甚巨的流派,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把语义分析作为文学批评最基本手段;新批评派一反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把研究的重点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内部研究”方面来,以突出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20 世纪中期达于鼎盛的结构主义文论及相关的符号学、叙事学,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上的应用,也是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等文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它也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注重研究与作者无关的文学文本本身及其“构造”和“关系”,以揭示文学文本表层结构底下的深层意义或结构。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的反动,明确打出反人本主义的旗号。结构主义之后的解构主义虽然致力于消解结构主义,但在细读文本、从文本语言切入展开解构批评的思路与结构主义一脉相承;它虽与科学主义的主旨不合,但更自觉地反对人本主义,如德里达有一篇论文题为“人类的终结”,一语双关,既指人走向终结,又指人本主义哲学维护的人类自身目的的终结。

当代西方文论两大主潮的上述划分和勾勒只是大体上的,有一些很难归入任何一脉,如解构主义就是;此外,这两大主潮在发展过程中经常有碰撞、冲突,也时而有交流、沟通

甚至互相渗透、吸收,譬如原型批评,既受精神分析学影响,又受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是多种思想学说的交融与综合;又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也存在着某些自觉综合两大主潮的努力;解释学与接受理论在坚持人本主义的大前提下将“语言—意义”的结构主义基本思路吸纳进来;女权主义批评也有兼容两者的特点。总起来看,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论中两大主潮交融渗透的趋势有所增强。不过,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论,则有许多后现代特点,很难简单地用两大主潮及其交融来概括。

0.2 两次转移

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

19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占主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尽管它们有种种不同,但在研究重点上却完全一致,即都以研究作家为主。譬如浪漫主义文论强调天才和“主体第一性”,因而主要关注作家的创造性想象、灵感等;现实主义文论虽然把艺术真实性放在首位,但通过对作品的研究,还是把批评的重点落在作家身上;实证主义则更关注作家的生平、传记等方面的研究,试图与其作品互相印证。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一开始仍然延续了上述研究重点,如象征主义、意象派和表现主义文论就是如此;精神分析学批评在这方面又有所发展,如弗洛伊德把作家的作品与作家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理乃至病理历程结合起来研究,以后者来解释前者;直觉主义和意识流文论,仍然重点研究作家的心理、意识活动。

但是,从二三十年代起,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的崛起,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开始发生悄悄的变化,即从以作家研究为主逐步转向以作品研究为主。如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不关心有关作家的生平与心理;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两方面的联系一刀切断,只孤立地研究文学作品本身;到了结构主义,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罗兰·巴尔特声称,作品诞生后,“作者死了”,作者意图与文本无关。

关注的目光从作家到作品,这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重点的第一次转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如英伽登认为读者也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创造,萨特也对读者的再创造给予高度评价。结构主义文论后期也开始注意读者的阅读问题。到六七十年代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则完成了当代西方文论第二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即从作品文本转到读者接受上来。这个转移到解构主义文论达到顶峰。

20世纪文学理论研究重点的这两次转移不只是研究对象或重点的偶然转移,而且反映了文学观念的历史性、根本性变化。每一次转移的结果,导致对前一种研究思路和格局的总体性扬弃,从而引发整个文学观念的全局性变革。正如美国文论家汤普金斯所说:“由于把重点放在读者方面往往会先销蚀、后来又破坏客观的文本,注重读者作用的批评

家就越来越致力于重新界定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起初只是重点从一部文学作品的叙述者向它所指的读者的一次小小的转移,结果却变成了世界观的改变。”^①不仅从文本向读者的转移是如此,第一次转移也是如此。这两次转移既体现了整个文学活动中“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三个主要环节的逻辑顺序,也显示了20世纪西方文论历史演进的基本轨迹。

0.3 两个转向

当代西方文论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非理性转向”,二是“语言论转向”。

首先看“非理性转向”,这主要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文论同古典哲学一样,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并无根本冲突。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动物,人能认识和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迷信被人对自身理性的发现和肯定所替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而且也无限增强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主义始终占据统治地位。那个时代,人本主义与科学或理性主义完全一致,理性原则可以说正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文论也一样,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论到19世纪初的黑格尔美学,贯穿于其中的主线也是理性主义。但19世纪起,随着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理性主义开始衰退,叔本华、尼采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问世,使传统的人本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之间出现裂痕,为20世纪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埋下了伏笔。进入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和文论中非理性主义逐渐占了上风。这就是所谓的“非理性转向”。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文论认为,传统的科学理性远远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尤其不足以认识人类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世界;在人类精神活动中,还存在一个远大于科学理性范围的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心灵活动领域,如处于自觉意识阈限以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像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等等。当代西方文论,主要是人本主义文论于是继承叔本华、尼采的思路,把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人的非理性方面,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如克罗齐、柏格森对直觉的推崇;弗洛伊德、荣格对无意识领域的开拓;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重视;苏珊·朗格对作为“前逻辑”方式的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注意;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的强调和要用“思”与“诗”把语言从逻辑和语法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伽达默尔“合法的前见”的提出;姚斯对“审美期待视域”的解释;德里达要“涂去”概念的逻辑表达方式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挑战与突破,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的发现与张扬。这种“非理性转向”,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和更新,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拓展。

^① 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引论》,见《读者反应批评》,纽约1980年版。

其次是“语言论转向”^①,这主要是就科学主义文论而言的。“语言论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的转向。在古希腊,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是什么”。针对这一质询,各派哲学分别从各自立场作了回答,从非常具体的水、火、土到相当抽象的“数”,这是他们对世界本质的基本看法。到17世纪,欧洲哲学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人们所说的“认识论转向”。在此“转向”上,哲学由对世界本质的探询转到了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在这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哲学的真理由自明转为了有待证明、有待检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这一“转向”中起到了带头人作用。他认为,对一切公认的传统观念和意见都必须用理性来加以批判,这一哲学立场成为对经院哲学推崇信仰的反拨,也成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经历“认识论转向”之后的欧洲哲学,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者侧重于追问“我们知道的究竟是什么”,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则侧重于探询“我们是怎样知道的”,两者各有特色,但都已将“认识论”作为研讨的重点。

由笛卡尔开创的“认识论”哲学,在欧洲17至19世纪的两百多年间成为哲学的主潮。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部分由于受到索绪尔理论的启迪,更多地与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相关,西方哲学逐渐由认识论轴心转到语言论轴心。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的问题。^③ 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1918年出版的《普通认识论》也表达了类似见解。他在1930年发表的《哲学的转变》一文已隐含了“语言论转向”的提法,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④。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题目即为“语言论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⑤。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语言论转向”问题在学界已有了自觉。

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使得它的立论基点与前大为不同。17世纪以前的哲学更多关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似乎弄清了它,其他疑难都可迎刃而解;认识论的哲学关注“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它要求在对世界作出判断以前,应先对认识的可靠性和可能性作出回答;而语言论的哲学则关注“我们如何表述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本质”,它对前两类问题并未简单否定,但强调要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语言论转向”首先体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接受、借鉴索绪尔

^① linguistic turn,直译为“语言学转向”,本书采取王一川的译法“语言论转向”,详见《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③ 罗素:《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伦敦1915年版,第1—4页。

^④ 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⑤ 罗蒂编:《语言论转向》导论,芝加哥1967年版,第3页。

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新批评派也集中研究作品的“文本”和“肌质”,即其中的语言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结构主义超越了新批评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分析的局限,把具体作品文本看成表面的文学“言语”,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

“语言论转向”在当代人本主义文论中也有所体现。早在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文论中,就提出了美学等于语言学的新观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看成人的生存的家园,认为诗的本质就是用语言去神思存在;伽达默尔同样也把语言置于解释学文论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非理性转向”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语言论转向”主要体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但这只是就大体而言,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转向在两大主潮中常常交叉重叠,很难截然分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个转向在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巨大覆盖面和普遍性。

上面,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作了简要的客观审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元发展,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态势的具体表现,一是流派繁多,本书将要涉及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1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更迭迅速,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盛时期的周期更短,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文论、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等作为流派存在时间都较短,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时间跨度长一些,但高峰期也不过几年,很快就被其他流派所取代;三是许多流派之间既有尖锐冲突,又相互交叉、重叠、影响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如荣格就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又是原型批评的奠基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容纳了众多流派的代表人物,罗兰·巴尔特前期是结构主义者,后期成为解构主义的中坚人物。总而言之,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可以用“纷纭复杂”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我们时刻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对其中每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学说,都要以清醒的目光、科学的态度,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和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还有人认为当代西方文论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诚然,当代西方文学艺术与文论有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成果来丰富、充实、发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并不代替文学和批评的具体研究,但它能正确地指导我们进行文学和批评的具体研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本书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分析当代西方文论,努力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下面,我们将对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与思潮逐一加以评介。

1 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19世纪西方文学随着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逐渐衰落,象征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前期象征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法国的诗歌流派,代表人物是波德莱尔、魏尔兰、兰波和马拉美。他们同时也是前期象征主义诗论的主要代表。波德莱尔十四行诗《应和》首次提出著名的象征主义“应和”论,认为自然界万物互为象征,组成“象征的森林”,而人的诸感官之间亦相互应和沟通,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界之间也是互为应和、交流的,诗就是这种象征、应和的产物,故该诗被誉为“象征主义的宪章”。不过,首先提出“象征主义”概念的不是波德莱尔,而是希腊诗人让·莫雷亚斯。他于1886年发表《象征主义宣言》,正式用“象征主义诗人”来概括法国这批新潮诗人。前期象征主义诗论与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不同,主要强调展示隐匿在自然世界背后的超验的理念世界,要求诗人凭个人的敏感和想象力,运用象征、隐喻、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法,通过丰富和扑朔迷离的意象描写,来暗示、透露隐藏于日常经验深处的心灵隐秘和理念。前期象征主义随着1898年马拉美的逝世而告终。

20世纪初,后期象征主义诗潮再度崛起,并从法国扩及欧美各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瓦莱里,英国的叶芝、西蒙斯等,他们也都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批评。与该派密切相关的,还有英美诗人庞德、休姆等倡导的“意象派”诗歌与诗论。本章主要介绍后期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论。

1.1 瓦莱里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

保尔·瓦莱里(1871—1945),出生于地中海滨小城赛特,母亲是意大利贵族后裔。后移居蒙彼利埃,曾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1894年起定居巴黎,曾在国防部任文稿起草人,1900年后到哈瓦斯通讯社工作。大学时代就崇拜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并显露出非凡的诗才。后一度转向数学与哲学的抽象研究。1912年将青年时代诗稿结集为《旧诗集存》出版;1917年发表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一举成名;1922年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海滨墓园》标志着其诗歌创作的顶点。他的诗歌创作把象征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21年被评选为“当代法国最大的诗人”。1925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37年法兰西公学专门聘请他为诗学课教授。他逝世时,戴高乐将军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主要活跃于20—30年代,主要著作有《尤帕利诺斯》(1923)、《灵魂与舞蹈》(1923)、《文学杂集》(1924)和三本续集(1930、1936、1938),他的诗歌评论文章在他死后被收入《瓦莱里选集》第7卷《诗的艺术》中。他的诗歌理论使他成为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论

的主要代表。

1.1.1 象征主义的现实存在

象征主义诗潮在法国已活跃半个多世纪了。瓦莱里作为马拉美的门生,深受象征主义诗歌的熏陶与影响,但也感受到象征派内部在美学观点上并不一致,而这正是当时一些人否认象征主义在文学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理由。有鉴于此,瓦莱里一方面承认,“那个可称为象征主义的群体并不基于一致的美学思想;象征主义不是一个流派。相反,它容纳众多具有极大分歧的流派”。另一方面又指出,象征主义作为一种群体的精神、一种创造活动是确实存在的,并自信“能够通过某种综合重建那个时期的精神,那个后来得名为象征主义的群体的精神”^①。他从三方面论证了现实存在着的象征主义精神:

第一,象征主义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瓦莱里认为,象征主义诗人视现实世界为可鄙的、不真实的,他们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他们感到真切存在的只是“大自然和生命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某些作品”所赋予的激情,诗人能从中汲取“珍贵的感觉、无限丰富的思想以及思想、情感、严谨和幻想的奇妙组合,还有与神秘相连的快感和活力”,并孕育出“应和”的象征主义诗作。

第二,象征主义追求一种“创造读者”的自由的艺术创新。瓦莱里认为,象征主义精神决不屈从于读者的已有口味和审美习俗,而致力于一种艺术创新活动,它“用创造读者的作品渐渐取代那些依从公众习俗及偏好以吸引读者的作品”,就是说,象征主义诗歌要选择趣味高雅的读者作为对话人,同时要通过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打破读者旧的审美习俗和惰性,培养和“创造”出有创造性的新读者。在此意义上,瓦莱里宣称“象征主义作为一个创造的时代脱颖而出”,那是“自由的寻求,是献身者在艺术创造中承担一切后果的绝对的冒险”。

第三,象征主义诗人虽有文笔、手法、见解、感觉和写作方式及美学理想等许多方面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强大的凝聚力,即他们反对只写人性的共性与普遍性,而高度重视个性、个体的内心活动与反应,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力图重建个体的精神史。

这样,瓦莱里从群体的精神上肯定了象征主义诗潮的现实存在。

1.1.2 象征主义的界定:音乐化

对于象征主义诗歌的界定,瓦莱里同其前辈及同时代人颇不一样,既不同于“应和”论,也不同于“暗示”和“神秘”论,而是独特的“音乐化”论。他在总结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时说道:“马拉美毕生的问题……就是还诗歌以现代伟大的音乐作品从它那里夺走的王国”;在另一处他说得更明确:“那被命名为象征主义的东西,可以很简单地总结在好

^① 瓦莱里:《象征主义的存在》,《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本节凡引文出自此文者,不再一一注明出处。